



▶ 李喜所：中国学科的“本土化运动”

热

## 李喜所：中国学科的“本土化运动”

[ 作者：李喜所 转贴自：社会科学报 2010-3-16 点击数：121 文章录入：teadmin ]

## 留学生领军中国现代学科转型

学科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，其基本布局、内部结构和实际运行直接受特定的知识系统所左右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有什么样的知识系统，就有什么样的学科设置。进一步讲，囊括学科的教育，也是一定的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集中反映。教育的内容，直接展示的是知识的整体面貌和传播方式。一旦知识发生变异，学科设置及教育体系就随之重构。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期，知识系统没有定型，处于探索阶段，孔子式的讲学和百家争鸣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；汉代的儒学定于一尊和经学的自成体系，让学校教育浮出水面；佛学的输入和宋明理学的诞生，升华了儒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架构，科举教育和书院林立，以及八股的涌现，为这种知识系统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。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，传统的古典知识很难派上用场，尤其是代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畸形的洋务运动的启动，西方的一套新知识变成了治国安邦的“法宝”。军事上旧式的冷武器向现代的热武器的转变，工商业方面工厂企业的经营与发展，运输通讯业的新技术，矿山的开发和运营，富国术和经济理论，乃至制度及人文，都随着现代化列车的开动，迫不及待地由西方引进了大批新知识。新式学堂的涌现和科举制的废除，就是西方新知识大量涌入的必然结果。如何构建符合新知识内在规律的新学科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被提到了议程上来。

中国古代，并无学科的分类，更少学科意识。科举考试只有文、武两类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也不过是对历史文献的区分。当仿效西方创建大学之后，学科分类才成为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虽说在洋务学堂创办的过程中，这些中等专科学校已经涉及到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等学科的课程、师资、实验设备等问题，但真正去组建一个学科的思想准备、物质条件基本不具备。所以，当1895年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创办的时候，只能委托美国传教士丁家立来具体筹建各个学科。此后陆续建立的大学，如1897年的上海交大、浙江大学、1898年的北京大学、1902年的山西大学等，基本是模仿欧美或日本，全盘照搬。这种移植式的学科构建，只能按照文化移植、文化迁移、文化交流的基本理论和路数去研究。就近代中国新型学科构建过程的特点来讲，最突出的是移植过程中的“水土不服”，即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，也就是社会文化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学科的建设，并转而制约学科的发展；就近代中国新型学科构建过程的难点来说，虽然很多，但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。近代中国的大学学科，十之八九由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建。仅以张伯苓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为例，各学科的创办者基本是留美生，如数学系是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，化学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邱宗岳和耶鲁大学博士杨石先，物理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，生物系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应尚德和耶鲁大学博士李继桐，经济系是耶鲁大学博士何廉，历史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，政治系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林同济，哲学系是哈佛大学硕士汤用彤。这种现象的出现，与人才短缺及留学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储备有关。

从1872年和1877年向美国、欧洲派遣留学生开始，就开创了一条中国高级人才培养的切实有效的新途径。20世纪初的帷幕拉开后，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，造就了一支中西兼通的新知识群体，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的中坚力量。值得骄傲的是，留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，大体代表了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。这批人大多有较好的传统文化根基，对西方文化亦有较多的了解，中西融会，亦土亦洋，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，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。留学生文化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及交融的产物，也是中国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必由之路。现代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，正好需要留学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复合型人才，所以留学生无可推脱地占据了现代中国学科发展的核心地位。无论是传统学科的改造，还是新兴学科的创立，归国留学生都是领军人物。

## 现代转型与学术共同体密切相关

学科发展更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机体，特别是与社会公共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。因为每一个学科必须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匹配，否则就将社会和学科隔离，停留在闭门的“学院”式研究的自娱自乐，缺乏应有的动力，变成一潭死水，毫无生机。所谓学术共同体，就是自由、平等、活跃的社会交流平台，包括学会、学术会议、相互讲学、对外学术交流、专业学术杂志、报纸等。学术共同体的创建，无形中强化了不同学校的学科竞争与相互借鉴，还将学科延伸到了社会，促进了学科和社会的沟通。在近代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，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，都与学术共同体的相对完备、十分活跃密切相关。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法学等，在学会的组织和活动、专业杂志的影响力和权威性、学术会议的活跃和高质量等方面，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，再加上这些学科与社会变革联系紧密，其发展就迅速而强势。学科依托社会，社会带动学科，社会和学科良性互动，是历史证明了的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。而且，学术共同体的建立，又反过来为

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。按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，近代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于戊戌变法时期，其直接动力就是各地的维新派创立了许多学会，办了不少报刊，并力所能及地建立新式学堂。湖南的时务学堂和那里的南学会紧密配合，将新知识通过学会这一平台向社会传播，并通过学会提升了学术，从而保证时务学堂教学的高水平；同时还有《湘报》的宣传鼓动，遂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富朝气的一省。历史地看，戊戌变法的最大功绩是首创了一个虽然弱小，但发展强劲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。一些大学随着维新运动的建立和发展，和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的出现密切相关。辛亥、“五四”之后，随着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大，大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，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则与之同步，也开创了一个新阶段。

#### 本土化是现代学科建设中的难点

知识无国界，学科全球通。国际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命线。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亦是如此，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，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。即使像语言学、历史学等，古代中国就有，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，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。汉语言学的学科体系，是从马建忠在欧洲研究西方语言学后，写出了名著《马氏文通》，才有了语法结构、词汇识别、语言学理论等基本知识，再通过一批由在欧美、日本学语言学的归国留学生如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等人的努力，才逐步建立起来的。没有西方语言学的输入，汉语言学学科不可能在大学立足。历史学也是一样。古代中国确实有很好的治史经验和传统，但并没有形成今天所理解的独立学科，迟至20世纪前半叶，随着进化史观、唯物史观、新人文史观的输入和新的现代研究理念和方法的采用，才变成一门新学科。和历史学联系紧密的考古学则是李济、梁思永等留学前辈从西方引入的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过程。

和国际化相比，本土化却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难点。所谓本土化就是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对学科进行能动的改造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科创新的过程。和植物的移植大致相仿，现代学科的成长壮大必须逐步适合中国这块土壤。但这决不是被动的适应，而是积极的创新，也就是以现代的理念和方法改造古典的旧传统，让本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衔接，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创新学科。经济学科的发展基本是这样，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，让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，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。20世纪30年代，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起了“本土化运动”，核心是教学科研、学科建设要结合中国实际，知中国，服务中国。教材要自编，尽量少用外国教材；研究课题要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，服务社会，参与社会。通过与社会的沟通，学科的发展随之就本土化了，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的本土化，而不是故作姿态，为本土而本土。这中间有两个问题常常会使本土化走偏。一是“食洋不化”，在根本没有精通西方文化的情况下，简单地拿来主义，用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所谓现代文化来推行本土化，会化成什么样子，不言自明。人类文化的基本原理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，对西方的东西研究得越准确，在与中国本土的结合上才越有效。实际上，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新文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运用的过程。二是“食中不化”，中国的东西真正弄通搞懂，融会贯通，并不容易，只有知中华社会文化之真谛，才可能在学科建设中很好地将西方新学科和中国本土融合创新。所以张伯苓在本土化运动中特别强调要懂中国。如果西方的真懂，中国的精通，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- 上一篇文章： 曹旅宁：睡虎地秦简《编年记》性质探测\*
- 下一篇文章： 赵庆云：瞿同祖1980年代的三次出访

[【发表评论】](#) [【告诉好友】](#) [【打印此文】](#) [【关闭窗口】](#)

#### 最新5篇热门文章

- 回忆录：徐匡迪口述回忆——我…[145]
- 书评：高国潮：史学研究新突破…[13091]
- 张仲民：海外汉学掀起新文化史…[98]
- 刘浦江：邓广铭的学术道路[105]
- 艾维四：对中国和日本“十七世…[105]

#### 最新5篇推荐文章

- 《史学研究网》寄语[6172]

#### 相关文章

没有相关文章

 **网友评论：**（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，与本站立场无关！）

没有任何评论

[| 设为首页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联系站长](#) | [友情链接](#) | [管理登录](#) |

2004-2007版权所有：史学研究网